

王光祈譯

庫倫條約之始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庫倫條約之始末

第一篇 庫倫革命與外蒙宣佈獨立

(原書係第十二篇)

內容(1)蒙古問題之發生。(2)蒙古派遣代表到聖彼得堡，請求助彼抵抗中國。(3)余與中國迪克推多袁世凱之談話。(4)關於蒙古事件之俄國方面報告。

當一九一一年，中國發生革命之際，外蒙東部（或稱喀爾喀）與中國其他各地一樣，同時宣告獨立。至於蒙人脫離中國之理由，則以滿洲皇室既已覆亡，藩屬關係亦當然因而解除爲根據。其實中國革命一事不過僅爲庫倫獨立之一種導火線而已。蓋此種獨立之醞釀，實自北京政府蓄意兼併喀爾喀以來，即已早趨成熟，故也。華人之欲剝奪蒙人自由，吞併蒙古地方，固圖謀已久，不自今始。（北京政府）爲達此項目的起見，嘗於一八八〇年之頃，開始在東蒙方面實行『將王公領域夷爲殖民地』之政策。

該政府利用大部分旗人負債中國銀行商號之機會，遂將蒙人土地，分給中國該處移民。蓋當時旗人向中國銀行商號借款，皆以自己土地爲其抵押，故也。華人並在居有中國移民之地，組織中國管理機關，其後此項地方，遂漸漸變成中國政府領土。

此種政策，初行之於內蒙東部，旋即用之於喀爾喀方面。同時並沿着通達庫倫之主要郵道一帶，以及與俄疆域接壤之地，實施殖民手段。當二十世紀開始之際，（華人方面）遂決將吞併喀爾喀一舉，加速進行。並使治蒙事權，集中統一。派駐蒙古之中國戍兵，亦特別增加。又規定該地蒙人皆有學習華語之義務。此外華人更在該處開辦一個銀行，一家報館，鼓吹蒙古應行完全合併中國，云云。在此種北京宣傳影響之下，於是蒙古王公 Karagin 與其他幾位業已變成華人之內蒙古王公，特向北京政府呈遞願書，自行請將地方政權，交與中國一位特派督臣，並以齊齊哈爾爲該督臣駐節之所，云云。其在北京政府方面，又復竭力利用報紙之助，以使社會輿論，受其影響。其實社會輿論方面，雖無政府此種鼓動，亦早已自願，對於促進華人在蒙勢力之必要情形，加以宣傳鼓吹，並嘗引舉俄國種種侵略計畫以聳觀聽。略謂俄國久在該地，煽動蒙古脫離中

國既以軍火供給蒙人，又派俄軍前往該處，云云。此外關於俄人在蒙陰謀之消息，外國報紙，尤其是德國日本報紙，亦多記載及之。該報等嘗將俄國吞併蒙古之鬼祟行動，加以刻意描寫。

至於俄國方面，對於幫助喀爾喀獨立自治一事，並非始終堅決。直到後來，俄國幾次設法與華妥協，皆遭失敗之後，始下決心爲之。中俄兩國會商改正一八八一年聖彼得堡條約（譯者按，即同治七年伊犁條約）一事，既無絲毫結果；於是遂使俄國發生直接與蒙交涉或可度出難關之想。並採用最簡便之手段，以保持俄國在蒙之既得權利。其時外間頗有一種流言：所謂俄國政府意欲利用中國革命機會，直將蒙古據爲己有，云云，實屬一種無稽之談。吾人只舉下列一例，便可爲之證明。即談判蒙古問題一事，係在一九一一年春季開始，換言之，其時尚在中國革命之前也。當時俄國要求中國者，爲保持外蒙現制，減少中國駐軍，縮小移民範圍，諸事。而中國政府方面，則以俄國此項條陳，有關中國內政爲理由，直將俄國要求，斷然加以拒絕。

辦事大臣三多，爲中國駐在庫倫之代表，同時並爲主張同化政策一派之領袖。彼

因採用嚴厲手段以及粗野態度對待活佛之故，曾引起蒙古王公喇嘛方面之仇怨。於是蒙人不滿中國之心，漸漸增長。其表現於外者，最初之時，或在街上示威，或在各處暴動。其在華人方面，則又積極預備抵抗之法。假如中國在蒙軍力一旦充足之際，其勢必將採用最嚴厲之手段，以對付蒙人，此固毫無疑義，十分明瞭者也。從一九〇八年起，中國方面，即在庫倫開始建築營房，以爲安置華軍之所。

蒙古王公既恐雙方勢將發生衝突，於是遂在活佛主席之下，開一秘密會議，決定向俄求援。會議之結果，乃於一九一一年歲初，派一代表團，前往聖彼得堡。其團員爲素抱俄蒙親善主義之杭達多爾濟親王與活佛之金庫員司車林齊密特 *Cering Cimet* 以及大喇嘛 *Da Lama* 內蒙人員 *Haisan* 等等，在聖彼得堡方面，最初頗不願接待該代表團，因恐由此惹起中國誤會，故也。其後乃向北京（俄使），徵詢對於此種蒙古代表（應否接待）之意見，於是俄使答以應該接待，並引從前俄國既嘗贊助蒙人要求，且負有若干精神上之（援助）責任爲言。

當蒙古代表團既抵聖彼得堡之後，乃向俄國政府請求，贊助蒙古獨立之舉，並願

以「承認俄國保護」爲交換條件。至於蒙人具體希望，則集中於財政上軍事上加以援助兩層。換言之，即希望俄國借與款項，供給軍械，是也。（俄國）外部方面，對於局面（忽而）如此轉變之舉，顯然未曾料及。於是乃向該代表團指陳，對華斷絕政治關係之危，並勸彼等應與北京方面，謀一妥協之道。此外，又與該代表團相約，俄國當代向中國政府進言，並運動該政府將預定之對蒙計畫，加以取消，云云。當時俄國政府曾暫行議決，供給少數軍械與蒙，以作自衛之用。並將庫倫俄國領署衛隊，加至二百人。當蒙古代表團離開俄國之際，不免有點失望。初時，彼等竟自不敢決定，再回庫倫；因彼等甚懼華人報復，故也。至於北京方面對於蒙古聯俄行動，當然十分不滿。向使俄國不代該代表團力爲說項，則彼等之旅行，勢將感着無限困難無疑。

蒙古代表團之到聖彼得堡也，雖曾留下若干印象，但俄國外交界方面，却仍望中蒙糾葛一事，可由俄國之好意調停，得以和平解決。因此之故，欽命駐京俄使乃得（本國政府）訓令，將俄國前次所提外蒙事件條陳，（再向中國政府）提出。其時余適任駐京俄使之職，必須依照此項意旨，一與中國外長相商。（因此），一九一一年八月二

十八日，余致中國外務部公文之中，曾言：俄國對於中國在蒙所採手段，不能淡然置之；蓋此項手段，有危蒙古地方現狀，搖動隣居友好關係，故也。云云。（此外），余並提出建議，主張彼此共同協商此事。其後（中國）外務部回文之中，乃言中國在蒙所採手段，實未妨害俄國利益，並嘗飭令庫倫方面中國辦事大臣，勿用壓迫方法。云云。所謂『外務部』者，是卽後來中華民國改稱『外交部』之北京外務衙門，是也。余與外務部部員胡惟德爵士，對於此項問題，曾有一度談話。彼言：北京政府以爲將俄國所提條陳加以談判一事，實屬不可能；因此項條陳，無異干涉中國內政，故也。但爲顧全兩國友誼起見，北京政府願將庫倫華軍數目，加以減縮；而且對於改良蒙政及移民計畫兩端，暫時不再進行。云云。換言之，卽是對於我們調停之舉，根本加以拒絕。聖彼得堡方面，對於此項回答，認爲不能滿意。因欲壓迫華人再行讓步之故，俄國方面乃向蒙人宣言，彼等之獨立自治運動，當可獲得俄國助力。云云。

其時北京之注意點，雖爲中國革命運動擴大一事所引去；但中國政府對於蒙古事件之留心，却仍繼續不已。並積極預備完全合併喀爾喀一事。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因

爲武昌革命事起之故，於是遂將現被放逐之袁世凱召還（北京）攝政醇親王爲上行皇帝，光緒之兄弟，現在乃命袁氏解決此項難關，擔任組織內閣，並授以一種幾乎類似迪克推多之全權。袁氏因欲探知各國對於中國時局之態度；此外，如爲情勢所許，彼尙欲獲得各國助力（以解決中國時局）。以此之故，袁氏到京之後，立即遍訪各國公使，余亦其中之一。當彼與余談及現時交涉事件之際，乃謂余曰：彼甚望滿洲事件，能够加以解決。彼並引蒙古擾亂之事爲言。希望俄國因對華友誼之故，幸勿贊助該地混亂局面，云云。余遂答曰：俄國在北蒙方面，據有政治經濟利害關係，並與該地有歷史淵源，因此對於該地之運命，不能淡然漠視。但我們所希望者，僅僅限於維持該地現狀，節限中國移民，減縮中國駐軍，諸事而已，云云。於是袁世凱乃反駁曰：蒙古者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也。中國對於該地，當然具有依照己意將其辦理之權。但是假如俄國所提條件，果有接受之可能，彼（指袁氏而言）當進言（中國）政府，將其接受。

關於中國革命一事，（袁氏亦復談及）。彼謂：彼將採用一切手段，以保護帝制。蓋此種政體，與中國歷史實有密切關係，並與中國現刻進化程度，甚爲相合。至於彼之個

人，只算當今皇室之一位僕役。彼將應用全力，以助當今合法皇帝，以保現在大清皇室。據彼之意見，共和政體，在華萬無存在之理由；此種政體，在中華民族之中，未嘗具有根基，而且全與中國國民思路不合。彼對於中國將來或成南北分裂局面，或成完全瓦解現象，兩事，絕對否認。蓋如此則將與種族語言宗教素來相同之各省各區利益，全不相符，故也。現在各省分裂一事，不過一種暫時現象而已。此種現象僅係地方局部情形所造成，將來甚易加以協商解決者。彼對於唐紹儀以及其他政治領袖人物主張中國有改成共和政體之必要一事，甚不贊成。彼謂此種主張趨勢，乃係由於外人勢力使然。

袁世凱方面雖然表示願將蒙古問題，設法加以解決，但中國部臣方面，却將談判之舉故意遷宕，一直延至蒙古已在活佛領袖之下宣言獨立之際。此項宣佈獨立之事，係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舉行。其結果盡將中國官廳，逐出庫倫以外。於是中國官吏及其護兵，相率逃避於俄國領署之內。其後更由俄國方面保護彼等取道赤塔回華。此種庫倫新政府，係由一般最老 Aimak 王公（譯者按 Aimak 係族名。）所組織。內閣總理爲牙薩克圖可汗（Yasaktu Khan）內務總長爲大喇嘛 Da Lama 外交總

長爲杭達多爾濟親王，卽一九一一年歲首曾充任代表，前往俄國者也。但牙薩克圖可汗擔任內閣總理不久，卽行去職；因彼對於中國表示同情，故也。據云，其後彼爲人所毒死。繼彼長閣者，爲一位年事甚少之三音諾顏可汗 *Sain Noyan Khan*。當余逗留庫倫之時，彼猶擔任斯席未去也。

北京方面得到庫倫獨立消息，不勝憤怒之至。羣謂此事，乃係俄國從中作祟，云云。初時，中國政府方面，對於此事，認爲不甚重要。大約係希望蒙古此種熱烈愛國運動，可以漸漸冷淡下去；蒙人方面當不至於竟與中國爲最後之決裂。吾人對於華人此種樂觀情形，可於下舉一例見之。當一九一二年二月之際，換言之，其時華人失去北蒙勢力者，差不多已有三月之久；而南京新共和政府，彷彿對於庫倫獨立一事，尙未有所盡悉，乃對於北蒙方面，發出一種檄文，通告清室顛覆，由漢滿蒙回藏五族，創建共和之舉。至於蒙古宣言獨立一事，南京政府却絲毫置之不理。於是庫倫方面，遂以實行徵收華貨入口稅一舉，爲表示報復南京此項民國檄文之道。

華人方面爲搜求此事禍魁起見，於是一般報紙，無不開始攻擊俄國，並謂俄人暗

中幫助蒙古作亂，更藉口調停美名，以使蒙古脫離中國，云云。其後聖彼得堡方面，遂發表一篇俄國對蒙政策之官式報告，以爲答覆中國報章攻擊之舉。

當時俄國政界方面，對於蒙古問題，雖然認爲不甚重要，因而興趣亦復不甚濃厚；但十二月二十六日之政府宣言，却曾使彼等得着若干印象。於是報紙之上，嘗有討論蒙古問題之論文；並主張俄國對於蒙古事變，不應袖手旁觀；關於中國合併蒙古之舉，不應安然聽之，云云。同時我們國中學者，對於蒙古問題，亦復細心加以研究。素負盛名之著作家 Uchtonski 侯爵，曾致皇上一函，實開此次討論蒙古問題之先河。該侯爵建議，派遣一位特別親信之人，前往蒙古談判；並設法贏得蒙人對於『白種皇帝』之同情。此外，該侯爵又言：我們領事所具之威望，不足以當此重任。因而彼乃推薦現正擔任華人職務之俄人 Groth 男爵，堪任斯職。此君從前曾任蒙古金礦公司總理，並爲華俄銀行催索蒙人欠款，採用嚴厲手段，嘗使蒙人羣起而攻，集矢於彼。換言之，彼實不堪擔任此種和平使者之重責。至於 Uchtonski 侯爵本人，則嘗一度充任駐華特別專使之職。並於一八九六年前往庫倫，代獻俄皇奉送活佛之禮物；但彼對於此項使命，却未嘗

完成而去，蓋彼對於謁見活佛一事，不願依照蒙古禮儀，因而旋即啟程離去，未曾一見活佛，故也。

Uchtomski 侯爵之條陳，雖然未嘗發生效果，但此舉似乎對於皇上，終竟留下幾分印象。當（俄國）外交大臣薩善諾夫 Gasonov（其次）奏陳皇上之時，曾建議：「俄國對於蒙古時局，應採冷靜觀察態度，云云。」而皇上乃於札面加一硃批曰：「冷靜觀察——但不要因此竟將機會錯過！」

上述（俄國）政府關於蒙古事件之宣言，在日本方面，亦復引起若干注意。東京政府曾用極恭敬之態度，一請聖彼得堡勿忘一九〇七年及一九〇九年之條約。（原註：即係關於滿蒙勢力範圍者。按一九〇七年之日俄條約，曾於一九〇九年及一九一二年加以補充，其內容係劃分俄日兩國在滿之勢力範圍。其中有云：俄國對於內蒙方面，未有利害關係；但同時却望日本，亦不干涉外蒙事件，云云。其勢力範圍界線，係以經度一百一十八爲準。）並請詳細確定，俄國所謂「蒙古」這個名詞，其含義究竟如何，云云。其後俄國遂答日本，略謂俄國對於該名詞之含義，其解釋當一如日俄條約中所

引用所聲明者；而且對於此種解釋，決計照舊保持，云云。（未幾），日本駐俄大使 Motono 男爵，復向我們外交大臣，發表若干關於滿蒙問題之意見，並謂：日俄兩國在上述區域內之實際地位，殊有從速確定之必要，云云。但日使此種暗示，却未獲得（俄國外相）薩善諾夫 Goshonov 之注意。該外相只言：俄國對於遠東方面之和平，甚望其能够繼續保持；尤其是因爲巴爾幹形勢不穩之故，俄國對於歷來所抱（遠東和平）政策，不願加以放棄，云云。於是（日使）Motono 男爵遂謂：假如俄日兩國合作，以致與華發生衝突之時，則俄國駐紮 Irkutsk 及 Primorsk 兩區之兵力，實足以勒令中國回到理性行動，云云。

上文曾言，蒙古宣言獨立一事，在聖彼得堡官界方面，並未獲得何種回響。俄國政府深知此事將使俄華關係，趨於緊張之途；而且亦不相信，蒙古能在活佛之下，建立一個國家。此外，俄國政府並懼此種新設之蒙古政府，當然十分缺乏款項，勢將轉求俄國相助，此實與當時（俄國）首相 Kokovzev 所抱減政主義，殊屬不合者也。就大體而論，俄國實希望中國照舊保有在蒙主權，並未期盼蒙古竟與中國脫離政治關係。但是

俄國官界對於庫倫情形，雖然抱了幾許懷疑態度；而俄國陸部却於其間製成一種規模宏大之計畫，即組織蒙古軍隊由俄國軍官加以指導，是也。並擬派遣軍事教官團一批，由上校 Popov 帶其前往。此外，更於春間，先派騎兵大尉范西禮夫 Wassiljew 及哥薩克下級軍官數位，前往庫倫，並同時寄去由 Irkutsker 兵工廠所造之舊式 Berdan 鎗數百支，以爲此舉之先聲。

其時喀爾喀方面，東西兩 Aimak（族名）之間，開始發生權限之爭。即在庫倫一隅，亦復黨派紛歧。當蒙古實行驅逐華人宣佈獨立，以及華人大施搶劫之際，曾使一般蒙人情感一時十分熱烈。但繼此熱烈情感之後，反動勢所難免；對於前途命運，亦復頗然懷疑。親華一派，就人數而論，就歷史遺傳而論，皆極強盛。彼等雖暫時退在旁邊，却未嘗一刻忘懷政爭。至於蒙古獨立以後所組成之親俄派，又因爲時未久，實力不充。誠然，活佛及其妻室均屬於親俄一派；但蒙古王公及喇嘛等等，却皆保持一種觀望態度。此外，只有幾位具有覺悟之蒙人，係贊成組織一種半獨立區，由華俄兩方共同保護。

一九一一年正月，Barga（在 Chinesisch-Hulun-Buir 之內，爲滿洲之一部）亦

復依照喀爾喀之例，宣佈獨立。Barga居民對於中國所採之吞沒疆境土地手段，以及該國從一九〇六年起所施行之殖民政策，久已不滿。中國爲實行此種政策手段起見，曾任命 Taotai（道台？），並派遣軍隊前往。Barga 人民因恐喪失獨立之故，嘗對此事提出抗議。Barga 人民曾於一九一一年九月，召集國民會議，該會議要求中國撤退軍隊，停止殖民，並將行政事宜，交與 Barga 人民手中，云云。因此，雙方發生衝突。其結果，該地人民實行驅逐華官華軍出境，並向俄國求援，更與庫倫方面設法開始談判。俄國政府因爲 Barga 一地接壤中東路綫關係甚爲重大之故，於是對於此次雙方衝突之舉，認爲實有出來加以干涉之必要。並向中國方面表示，自願擔任調停之意。其後俄國公使遂與中國外部開始談判。並於一九一五年十月，簽定 Barga 一約，始告了結。依照該約，則 Barga (Hulun-Buir) 合組一獨立自治區，而立於中國中央政府之下；由中國置一副都統以治理之，其權與五旗統領（換言之，即是由五旗公選之統領）相等。並置鄉軍以維持本地治安。但中國方面得有派兵前往該地之權，不過須先期通知俄國方面而已。所有該地一切稅收，均須用之於本地事業。惟『鹽業專賣』之稅捐，則須

繳與中國國庫。所有該地中國居民與 Barga 居民，均一律享有平等權利。但關於『中國移民事件』，必須先得本地官廳允准方可。至於建築鐵路一事，則當以中國政府批准爲前提。（原書註：Barga-Hulun-Buir 爲黑龍江省之一部，在 Hing-an 山之西。其地居民爲 Burjäten 人及 Öleten 人，係由通古斯族 Dauren, Solonen, Orotschonen 等等所混合而成者。其區域係分爲『新 Barga』及『舊 Barga』兩種。前者爲八個旗 H-osun（旗名）所組成，後者爲九個 H-osun 所組成。在滿清時代，此項 H-osun 係按照『旗營』之例所編制。換言之，每旗之中，各置一位 Uherit 以領之；每兩個 H-osun 則共置一位 Golda 以領之。至於每個 H-osun 之中，復分爲 Somun 等等小部分；每三個 Somun 則由一位 H-osun Janggin 統率。）

當蒙人於庫倫宣布獨立，將彼等宗教首領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戴爲可汗之先，曾向俄國方面請求贊助。當時俄國帝國政府於回答蒙人之際，嘗勸以和平從事，宜與中國設法妥協，訂結一約，云云。俄國駐庫倫領事，更百計從中調停，以阻止張家口赤塔間電線之破壞，與夫庫倫大清銀行支店之搶劫，而且力助中國大臣三多取道俄國以離

蒙境。

未幾，北京政府所任命之對蒙交涉委員桂芬，遂向俄國駐京公使詢問：該使是否願意出任『友誼調停』之舉。同時，蒙人方面亦復請求俄國政府出來調解蒙華兩方爭執之事。

俄國政府對於華蒙兩方請求，欣然應允。但俄國政府之意，却以爲中國方面如不承認蒙人照舊保存自治政府，則華蒙妥協一事，勢難成立。而且俄國政府相信，或者終可尋得一種方式，以使蒙人關於中國拋棄干涉蒙古自治政府一事，得一確實保障。蓋蒙人方面，嘗視中國政府在蒙所採三種政策：（甲）設置中國官廳，（乙）駐防中國軍隊，（丙）移殖大批華人，爲存心干涉蒙事，故也。

因此之故，俄國政府於答覆北京政府代表桂芬之時，曾將上述三點特別提出；謂爲華蒙條約中，亟應解決之三種重要問題。

但俄國政府却深知，如果欲使蒙人心安，則對於蒙人方面，不可不令其澈底了解者，即蒙古境內舉凡一切有關該地進化之施設，無論俄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皆將與以